

# 战后日本的媒体文化与“战争叙事”之变迁

福间良明（立命馆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苗 凤科

在二战后的日本，“反战”思想成为了社会共识。聚焦在批判军队的电影《日本战歿学生的笔记 听，海神的声音》（1950年）大获成功，其原作的战歿学生遗稿集成为岩波文库至今的畅销书，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然而，二战后的日本，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不尽相同。GHQ（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中译：驻日盟军总司令、訳者注）的占领期结束后，出现了关注士兵们复杂情绪的战争电影（如1953年の《云之彼岸（原名：『雲ながるる果てに』）》等）。1960年代后期，还出现了关注“无意义死亡”的特攻队的电影《啊，同期的樱花》（1967年）。与此同时，年轻一代猛烈批判了执着于战争体验的战中派（在20多岁时迎来战争结束，在战争中被动员参战的人数最多的一代），并质疑了他们的“受害者意识”。

另一方面，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以国家支持保护的靖国神社运动为代表的“对死者的彰显”动向也引人注目。不过，在知识分子的言论或部分战争电影中能看到一种动向：通过关注死者临终前的心情来排斥彰显的政治性，思考对国内外的责任。

本报告主要通过观察战争电影及其同时代知识分子的言论，来探讨关于“体验”、“责任”、“加害”的讨论所产生的背景，并同时探讨其可能性和局限性。

## 《海神》的大热

1949年，战歿学生的遗稿集《听海神的声音》（东京大学协同组合出版部）出版了。该书收录了来自大学和旧制专门学校的75名战死学生的日记和信件的抄录，并没有像小说那样的故事情节。尽管如此，这本书成为1950年年度畅销书的第四名，出版大热。“对战争的反感”，是这本遗稿集的基调。尽管学生们被哲学和自由主义等思想吸引，对学问有着深厚的热情，却不得被迫参加违背自己意愿的战争。这本遗稿集的热销，正是来自对这种“反战”意识的共鸣。旧日本军在组织上的病理性，和在战地的暴行，已经通过东京审判等方式被广为人知。最重要的是，军队一边宣扬“圣战”的美名一边压迫国民的生活和言行，最终导致彻底失败，对此人们怨念深重。遗稿集的这种“批判战争”、“反战”的情绪，让无数读者为之感动落泪。

1950年，据遗稿集制作的电影《日本战歿学生的笔记 听，海神的声音》上映。这部电影的基调是“暴虐残忍的职业军人”与“理性反战的学徒兵”的对立，电影与原作一样，大获成功，使陷入经营困境的电影公司（东横电影）得以重振旗鼓。

然而，这部电影和遗稿集能得到全国性的共鸣，细想下实属奇妙。昭和初期高等教育机关（大学、旧制高中、旧制专科学校等）的升学率，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在这本书中牺牲的学生们是社会上极少数的精英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明显不同。而为什么日本民众普遍会为《海神》流下热泪呢？

可以指出，这一定程度来自对“教养”的向往。从大正时代（1912~1926年）到昭和的1960年代，大学和旧制高中都推行着教养主义。要成为精英，必须熟悉哲学、思想、文学、历史的经典著作，陶冶塑造自己的人格，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规范。然而，这并不完全是精英

知识分子的专属。特别是战后初期，那些没能接受义务教育以上教育的奋进青年为了填补内心的遗憾广泛书籍，旨在探讨读书、生存方式、社会批判等课题的“人生杂志”类书籍被广泛阅读，青年团、青年课堂也经常举办读书会<sup>1</sup>。对过去战争的疑问，让青年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思考生活和社会。这其中也包含对“教养”（这类文化）的社会性的憧憬。

讲述战死的精英学生们的《海神》（遗稿集·电影），也是这类“教养”的象征。在遗稿集和电影中对哲学思想的言及，重新调起了观众们对“教养”的向往，激起了被剥夺了获取“教养”权利的学生乃至全国民的悲哀，以及对导致这种状况的军队·政治领导人的愤怒。

### 战前知识分子的违和感

然而，《海神》的大热，也带来了一些否定的声音。尤其是年长的知识分子们，多指出战死学生的叙述中体现出的教养的“浅薄”性。放眼今天，《听，海神的声音》中的描述并非“没有教养”，反而可以感受到主人公们对田边元、康德等哲学家的深入关注。然而，当时的年长知识分子们并不这么看。

从时代上看，他们属于在战争之前就意识形态定型了的战前派，在大正流行民主主义的时期，广泛涉猎了西方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比之下，那些在二十出头的时候战争结束的战死学生们（战中派），在他们开始记事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就已经爆发，他们接受初高中教育的时候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他们在战争时代里度过了青春期，几乎没有接触过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机会，和年长的一代相比，接触西方古典的机会也相当有限。战前派的知识分子们正是在《海神》中感受到了这种教养体验的差异。恰逢彼时朝鲜战争爆发，日本也在讨论重新武装、修改宪法和恢复征兵制的课题。年长知识分子们的言论中体现了诸如“不应该止步于感伤和浅薄的教养，而是要思考如何从反思中引导出反战思想”、“或许我们缺乏构造此思想的社会科学素养”等思考<sup>2</sup>。

但说到底，在战后谈论“反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试图掩盖战时自己的言行。不仅是学生们，即使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士，在战时也有很多人写了赞美战争的文章，或者参与了日本主义的运动。一般的民众，也通过邻居会、妇女会、青年团等方式积极参与了战争的推行。尽管如此，战后他们往往会像那些事情不曾发生过一样，高声疾呼“反战”。吉田满，一名从被击沉的大和号战舰上奇迹生还的前学徒军官，对这种情况是这样批判的：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这样一种风潮主导着我们：并不是吐露在战争中自己真实的言行，而是否定与战争有关的一切，把自己塑造成战争的受害者，或者是秘密的反战者，试图与战争彻底绝缘。<sup>3</sup>

这是针对战后日本的“反战正义”问题的尖锐质疑。有时候，“反战”也会令人们回避曾经高呼“圣战正义”的过去，远离责任意识。

### 对“反战正义”的怀疑

这种对“反战”言论的违和感，也反映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的媒体文化中。1952年6月，白鸥遗族会编辑出版了《云之彼端 战死飞行预备学生的笔记》，次年，还上映了根据此书改编的同名电影。虽然并不像《海神》那样出名，但这部引起了关注的遗稿集与它的电影版，通篇表露着学生兵的“纯真”。他们被迫放弃学业，与恋人分离，对自己的生命即将被剥夺而苦恼，却勇敢地接受和战友一同赴死的命运。这种人物形象在这些作品中显现出来，与强调对战争表达愤怒的《海神》形成了对比。

能够实现此类的战争叙事，很大程度上源于 GHQ 占领的结束。旧金山和约于 1952 年 4 月生效，占领统治就此结束。此前被压抑的对旧军的怀旧、反美情绪和对东京审判的批判声如潮水般涌现。学生兵和特攻队员的“纯真”性得以被叙述，也是源于这样一种言论环境。

不过，这一现象，也促使人们思考“为什么当时大家没有反对战争”这一问题。在《海神》里，虽然描绘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们的“反战”心情，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旧制高等学校或是帝国大学的顶级精英学生中，日本主义的学生运动也曾经十分活跃<sup>4</sup>。在攻陷汉口（1939 年）和袭击珍珠港（1941 年）后，人们为“战果”欢庆，之后也鲜少看到人们积极拒绝支持战争的态度。

电影《云之彼端》的导演家城巳代治说：“我也曾是一个在特攻队远远的身后，为他们鼓掌的人。”、“至少我曾经不是反战者，反而更趋向于支持者。”然后他写道，他对“我们被欺骗了”这种观点感到抵触。“被欺骗了，这是多么令人羞耻的词啊。如果我真的是被欺骗了，我对欺骗我的人不会有任何恨意，只会对自己被欺骗感到厌恶而已。”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他在质疑曾经支持战争的自己，乃至整体国民<sup>5</sup>。对“纯真”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战时国民的“责任”提出的质疑。这个问题在一味强调“反战正义”的行为中往往被忽视。

## 世代间的隔阂

然而，这种视角在后来的媒体文化中并没有得到深入的发展。反而在进入 1960 年代后，表面上看到更多的是关于战争经历的世代间的隔阂。

被送上战场最多的是战中派的那一代人，他们倾向于重视“战争叙事的困难性”。这不仅仅是来源于受到军队内部暴力的憎恨和耻辱，还有他们作为在战场上野蛮行凶的日本军队一员，或是抛弃战友逃跑所带来的自责、懊悔和抑郁。正因为这些难以整理、难以言说的情绪，他们往往对简单明了或是相对愉快地讲述战争经历有着强烈的抵触感。

1960 年代的社会环境，使这种情绪更为强烈。1960 年，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修订的反对运动盛行，在 6 月 22 日即条约批准前夕，全国有 620 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成为战后最大的公民运动。对岸信介政府强硬的国会运营方式的反感，加上对日本可能再次被卷入战争的担忧，催生了这场运动的热潮。自然而然地，过去的战争经历也相应的被重提起来。然而，战中派一代对于将战争经历与当前政治状况相挂钩的讨论方式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不过是“方便”把战争经历的一部分情绪加以利用，而忽视了其他部分。此后的越南反战运动、冲绳归还问题和 70 年安保斗争兴起时，战中派一代的文化人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反应。

然而，年轻一代对此往往持反感态度。对于致力于学生政治运动的他们来说，战中一代的言行似乎在否定年轻一代运动的意义。此外，战中一代强调“战争叙事的困难性”的态度，让人觉得他们是在炫耀战场经历。没有战争经历的年轻一代在面对有战争经历的战中派一代时，只能处于劣势。这让年轻一代感到不满。

这种现象，也与教养主义的逻辑有相似之处。教养主义旨在通过阅读古典名著进行人格熏陶，因此，在这一观念下，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经典的老知识分子相较于年轻人而言具有压倒性优势。前文战前派知识分子之所以指出战死学生“教养不足”，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同样，当“战争”成为话题时，有丰富经历的战中派一代在没有战争经历的年轻人面前，处于优势位置。

年轻一代对战中派一代的态度感到不满，是自然的。在与战中派世代的会议交流中，他们时常批评战中派一代过于停滞于过往的经历，认为这种态度是没有结果的。1969 年，“海神像破坏事件”（立命馆大学为纪念《听海神的声音》的出版而设立的雕像，被学生们拉倒

了)，就是对这种不满的象征。

当然，战争大片依旧经常大热，年轻的观众也不少。然而其中也不乏一些作品，与描绘士兵们壮烈而悲壮美的传统方式，保持着距离。例如，1968年的年度票房（日本电影）第7名的特攻队电影《啊，同期的樱花》，虽然在制作·发行公司东映的意向下，不得不大量使用豪侠电影或黑帮电影中的明星，但最后一幕却以特攻机被美军炮火击落的场景收尾。电影导演中岛贞夫作为战中派的下一代，也指出他出于对“人们已经习惯了拿战中派人的体验空谈一气”这一现象的反感，在作品中强调了“死亡”的“无意义”（及对导致这种情况的社会的批判），而不是修饰美化死亡<sup>6</sup>。

### “对被害者意识的批判”

作为对战中派一代的不满的延伸，出现了“对被害者意识的批判”。年轻一代经常批评战中派一代的“被害者意识”，质疑他们不去正视战争期间“加害行为”的态度。在日本战亡学生纪念会（以《听海神的声音》的出版为契机在1950年成立的反战运动团体）的研讨会上，对战中派一代文化人的谴责也不少。

战中派一代在战场上的经历意味着，无论他们是否直接参与，他们都是曾经进行各种“加害”行为的日本军队的一部分。相反，没有战场经历年轻一代自然就没有在战场上的“加害”体验。这个“对被害者意识的批判”的论点，反转了战中派和年轻一代在关于战争体验论争中的地位，为他们对战中派的批判提供了优势。

不过，对于此事我们不能忽视越南战争这个当时的社会背景。美军对北越的空袭在报纸和电视上被大量报道，而参与这些空袭的美军大部分是从冲绳和佐世保出击的。这意味着日本在越南战争中的“加害”行为。同时，在越南的空袭也让人联想到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人民的空袭经历，同时也唤起了旧日本军对东亚各国的侵略记忆。在这个意义上，越南战争迫使人们正视了日本在战时及战后的“加害”行为。对战中派一代的“被害者意识”和“加害行为”的批判，一定程度上源于这样的背景。

补充一句，战后的日本电影并非从未关注“加害”行为。例如，市川崑导演的《野火》（1959年）描绘了在菲律宾战场上，寻找食物的日本士兵射杀当地居民的场景，同时也展现了当地女兵对日本士兵的强烈憎恨。然而，除此之外，电影中对“加害”行为的直接描绘并不多，反而大量描绘了日本海军的海战和特攻队的作战行动，仿佛是在回避这个问题。与陆战不同，海战或空战的话不必直接描绘对“人”（敌军士兵和当地居民）的暴力，可以只重点描绘军舰和战斗机等“机械”。《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1968年）等在1960年代大热的战争电影大多是讲述日本海军的海战和空战。这些主题（似乎可以）避免直接接触到“加害”和“暴力”<sup>7</sup>。然而，同时期，人们开始质疑那种回避“加害”话题的言论。这与刚才提到的，不同世代对战争体验产生的隔阂，以及越南战争的影响有关。

### 自我反省和拒绝彰显

关于“加害”和“责任”的问题，不仅在年轻一代，在战中派一代的讨论中也时常被提到。曾在莱特湾海战中沉没的战舰“武藏”上服役过的渡边清，战后在报纸上看到天皇和麦克阿瑟的合影时产生了强烈的憎恨情绪，感到天皇的行为就像是背叛了他死去的战友。这种情绪在1960年代后成为了渡边声讨天皇战争责任的契机。然而，渡边不仅仅是对天皇问责，他也开始质疑自己，因为他曾出于对天皇的崇敬而自愿参加海军，积极参与战争<sup>8</sup>。他不是借纠弹以天皇为首的国家领导人来给自己这方免责，而是也质疑了那些信任领导人、积极参战的普通国民，他们的责任。

进一步说，渡边的论述也是对“自身可能犯下的罪行”的质询。在他的自传体随笔《轰塌的神——一名退伍军人的笔记》（1983年）<sup>9</sup>中，他批判了大言不惭地炫耀在占领区的暴行的复员回乡农民，并同时自问：“如果我也在那个场合，我能肯定自己不会施暴吗？”。渡边的讨论，不仅涉及到自己直接的行为责任，也触及到了自己在特定情况下也会犯下的暴力行为的可能性。

这也引发了对制造暴力的结构其本身的质疑。首先，对于士兵们来说，他们施行暴力不一定是因为他们首先意识到这是“残虐”的，反而是因为暴力在某些情况下看起来不像是“残虐”的，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正义性”的行为。无视后勤支援的作战行动，上司们急于取得战果的晋升欲望，军队高层比起理性判断更推崇攻击性的态度——这种军队的组织氛围，常常强迫底层的士兵进行鲁莽的行军，把他们逼得自暴自弃。曾被征召为坦克兵的作家司马辽太郎，在描写战国时代、江户幕府统治末期、明治时代等的历史小说中，多次把昭和陆军的扭曲与故事情节交织在一起<sup>10</sup>。渡边清自我质疑“自己可能曾犯下的罪”的讨论，如果深入探究，也会涉及到由军队和政治的组织病理引发的暴力和失败问题。

这种问题意识，也导致了对彰显死者的拒绝行为。

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日本遗族会和自民党保守派为中心的活动，旨在将靖国神社国有化，让国家纪念彰显战亡者。对此，媒体、宗教界、教育界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无法保证政教分离，且可能导致国家神话主义的复兴，结果国会未通过该法案（靖国国家护持问题）。

大多数战中派文化人士也反对这个动向，但他们的论据略有不同。安田武和桥川文三等更担心的是，夸赞和表彰死者可能会掩盖死者对军队和国家的愤怒，最终导致死者的声音无法被听到。安田在他的《战争体验：给1970年的遗书》（1963年）中就已经说过，“对他人的死亡深感震撼”是活着的人的傲慢和颓废<sup>11</sup>。他是在质疑，战后“活着的人们”其实是在通过彰显死者，来逃避来自死者的怨念。

### “彰显”和“加害”的二元对立

然而，这种复杂的讨论在1980年代以后变得较为少见，反而，“加害（责任）”和“彰显”之间的二元对立开始凸显出来。

在靖国国家护持问题平息后，日本遗族会和自民党保守派开始更重视首相、内阁对靖国神社的官方参拜。1979年，A级战犯被合祀在神社的事实已经为人所知，因此在“战后40年”即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作为战后首位首相官方参拜靖国神社时，遭到了国内外的激烈谴责。1982年，关于日本入侵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叙述问题引发激烈争论，甚至演变成了外交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对过去战争的评价，开始二分为重视“彰显死者”的讨论和直面“加害责任”的讨论。这里看不到“被害”和“加害”的二元对立，而是“加害”和“彰显”的二元对立。

曾经，“加害”的问题与“自我反省”相联系，也可以看到一些（尽管微小）尝试去分析萌生暴力结构的机会，而不仅仅是特定个人的责任的思考契机。对于彰显死者的讨论，也曾有对死者的愤怒被掩盖了的担忧。甚至还有，对“反战”、“和平”的政治主张可能会使人们避开死者和体验者复杂的情感，功利性地滥用战争体验的质疑。然而，这些论点在1980年代以后变得模糊，总的来说，只有“彰显”和“加害”的二元对立不断被再生产。

同时，“战争体验的隔阂”也不再突出。比战中派年轻的一代开始具有社会话语权，而且，战中派文化人可能对年轻一代的冲击感到厌恶，关于战争体验的发言变得不那么引人注目。

目。实际上，像安田武和渡边清这样的战中派在 1980 年代过世的人也不少。必然地，关于战争体验的世代间的冲突几乎看不到了。

1990 年代冷战初结束后，在东亚各地区，此前被亲美独裁政权压制的个人赔偿问题变得尖锐，同时，处于“战后 50 年”这个节点上的日本，战争责任和殖民地责任备受关注<sup>12</sup>。在日本国内，尽管有许多媒体言论和市民运动试图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但同时也有广泛的“历史修正主义”的人反对这些行动，不仅否认战争责任，甚至试图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日本的战争行为。这种观点通过小林好典的漫画《新·傲慢主义宣言 SPECIAL 战争论》（1998 年）等方式，渗透到了流行文化中<sup>13</sup>。

媒体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的讨论比以前更多了，也出版了很多相关书籍。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彰显”和“加害（责任）”的二元对立，反而使这种对立更加深化了。那些试图思考“加害”问题的人往往不会接触到赞美的言论，反之亦然。因此，越是有多数的讨论，就越不会加速不同立场之间的交流，反而只会扩大二者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在冷战结束后的日本社会中尤其突出。

### 关于“传承”的断绝

在今天的日本，“战争记忆的传承”也在被广泛讨论。尤其是在“战争结束纪念日”的 8 月，这种倾向尤其明显。随着大量的战争体验者去世，采访变得越来越困难，背后的焦虑感越来越强烈。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试图“传承”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可以退一步来思考这个问题。

在 1990 年代看到的围绕历史认知的二元对立，并未在之后消失。在与东亚各国的紧张关系中，时常可见类似的激烈讨论。特别是在网络媒体上，这种趋势尤为显著。虽然涉及历史认识的网络言论数量庞大，但这并没有促进不同立场之间的交流，人们反而只是接触到自己喜欢的言论，并再次重复着不接受异议的状态。这在一方面是由于网络媒体的特性，即根据“检索”和“检索履历”来推动信息推送，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忽视其与 1990 年代以来的言论环境的连续性。

当然，历史认识问题并不总是受到关注。相反，在主流媒体中也经常出现一些冲突不大的话题，这些话题似乎是为了避免“引火烧身”。比如往往不深入探讨“彰显”或“加害”的问题，而是赞美所有人都不会否认的“记忆传承的重要性”。

然而，这些文章或言论中试图在“传承”的东西，变成了历经各种断绝和遗忘之后的清汤寡水。现今，很少有媒体关注对“死者的感慨”的抵抗，对“加害”意识的自我反省，对催生暴力的社会结构的关注，相反，“易懂性”正在成为主流<sup>14</sup>。

但是，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言论，我们会注意到不同观点的存在。曾经有一段时间，“断绝”比“继承”的话题更为突出，而在那时，围绕战争体验和记忆的各种论题争相浮现。“反战的正确性”有时遮蔽了什么？围绕“加害”话题的讨论是否是自己不相干的事？这是由什么欲望支撑的？更进一步说，我们该如何面对产生“加害者”的机制？这些论题在过去的媒体言论和媒体文化中经常可以看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会直接关系到日本与东亚关于历史认知的“和解”。但是，最近的讨论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而产生的？其中涉及了怎样的社会背景？有什么论题被遗忘了？探讨这些问题，是重新分析当今被视为一切已明晰的历史认知时，所需的基础工作。也许，不是面对“继承的历史”，而是面对“断绝的历史”、“遗忘的历史”，我们才能看清一些东西吧。

■ 福间良明 (FUKUMA, Yoshiaki)

1969 年生于熊本市。1992 年同志社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新闻学专攻毕业。曾于出版社供职。2003 年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人类环境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获博士（人类环境学）学位。曾任香川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现任立命馆大学产业社会学部教授。专业为历史社会学，媒介史。主要著作：《“战争体验”的战后史——世代·教养·意识形态》（中公新书，2009 年）。《战后日本、记忆的力学——“称作继承的断绝”与稳妥性的政治学》（作品社，2020 年）。《司马辽太郎的时代——历史与大众教养主义》（中公新书，2022 年）。

---

<sup>1</sup> 福间良明『「勤劳青年」的教养文化史』岩波新书，2020 年。

<sup>2</sup> 福间良明『「战争体验」的战后史——世代、教养、意识形态』中公新书，2009 年。

<sup>3</sup> 吉田满『「战舰大和」与战后 吉田满文集』筑摩学艺文库，2005 年，第 195 页。

<sup>4</sup> 井上义和『日本主义与东京大学——昭和时代学生思想运动的系谱』柏书房，2008 年。

<sup>5</sup> 家城巳代治「弱者的勇气」『教育』第 186 号，1965 年，第 64 页。同「关于电影艺术家的反思与自我革新」『映画制作』第 1 号，1946 年（南博编『战后资料·文化』日本评论社，1973 年，第 123 页收录）。

<sup>6</sup> 中岛贞夫『啊，同期的樱花』『映画艺术』1967 年 5 月号。关于特攻队内容的战后叙述史，如描述特工队的电影、遗稿集等，参见福间良明『殉国与反叛——「特攻」的叙述的战后史』（青弓社，2007 年）。

<sup>7</sup> 吉田裕『日本人的战争观：在战后史中的变迁』岩波现代文库，2005 年。虽然在战后日本的战争电影中多次描述了海军，但日本海军对重庆的轰炸等事件几乎未被关注。参见福间良明『殉国与反叛』（前文）。

<sup>8</sup> 渡边清『轰塌的神——一名复员兵的笔记』岩波现代文库，2004 年。参见上文福间良明『「战争体验」的战后史』。

<sup>9</sup> 本书作为朝日选书（朝日新闻社）的其中一本出版后，于 2004 年以岩波现代文库版再次出版。

<sup>10</sup> 福间良明『司马辽太郎的时代』中公新书，2022 年。

<sup>11</sup> 安田武『战争体验 致 1970 年的遗书』未来社，1963 年，第 142 页。

<sup>12</sup> 关于这方面的社会背景，参见浅野丰美编《和解学的尝试——记忆·感情·价值（和解学丛书 1）》（明石书店，2021 年）

<sup>13</sup>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遗稿集《听海神的声音》为原作的电影《听，海神的声音》（新版）在 1995 年上映了。电影中涉及了日本士兵对菲律宾居民的屠杀以及“慰安妇”等问题等，反映了“加害”的问题。然而，在对暴力采取批判视角的同时，渡边清提出的“自己可能也曾是犯下暴力的当事人”这种危惧并未得到描绘。这表明，对于把暴力正当化（视为其理自明）的社会结构的质疑已经淡化。参见福间良明『「战争体验」的战后史』。

<sup>14</sup> 关于“继承”话题的政治无害性所蕴含的问题，参见福间良明《战后日本、记忆的力学——“继承含义下的断裂”及政治无害性的政治学》（作品社，2020 年）。